

司马迁故里韩城门额题字文化阐释

杨雅丽

(渭南师范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考察了司马迁故里韩城现存的明清以来的门额题字,认为它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弘扬了民族传统美德;宣扬积极进取、入仕有为的价值观念;体现了耕读并重的民族文化特征。韩城门额题字有很高的文化研究价值,是新时期民族文化改造的宝贵借鉴。

关键词:门额题字;道德;仕进;耕读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2)02-0087-04

韩城是中国古代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故里,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东北隅。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在韩城老城区与闻名中外的古典建筑村落党家村,以及乡野村寨,存在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即门额题字。韩城有“小北京”之称,类似北京四合院的民居遍布城乡。其四合院为砖木结构,装饰上木砖石三雕俱全,堪称艺术珍品,又用门额题字、楹联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气息。韩城人或将题字书于木板,悬于门额,或直接在门顶砖墙上刻字。现存的最早题字产生于明万历年间,此前的门额题字,因建筑物留存时间之限,其形制已难追寻。明清数百年间,于门额上题字在韩城蔚然成风,门额题字成为韩城民居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韩城人数百年间创作了难以尽数的门额题字,或表现宅主的文化修养,或显示其政治地位,或为训诫子孙的品德圭臬;蕴涵丰富,文采典雅,加上书法高超,成为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现象。我们被司马迁故里丰厚的文化积淀所吸引,惊叹韩城人于尺寸间创造出如此意蕴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之大千世界。本文试将韩城门额题字置于中国文化语境中进行粗浅的阐释。

一、重道德教化,主张以德

育人治家,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

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最突出贡献之一。”[1](P279)韩城门额题字正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弘扬了民族的传统美德。道德类题字在韩城门额题字中占半数以上,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类题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德”字。如“富德居”、“树德”、“树德裕”、“树德务滋”、“滋德”、“种德”、“经德”、“敦德”、“尊德”、“厚德”、“蔚德居”、“勤德居”、“德业居”、“世德惟新”、“陋室德馨”、“德重乡评”等。“在文化史上,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确实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把道德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1](P279)中国人讲究“尊道而贵德”,认为高尚品格才是人性最高形式的体现。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儒家选择了一种道德至上的文化精神,孔子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并基于此提出礼、孝、悌、忠、恕、恭、信、敏、惠、温、良、俭、让、诚、敬、毅、克己等德目。儒家将“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提为“修齐治平”,视“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受传统文化以道德为首要价值取向的制约,韩城人在门额上频频书写“德”字,告诫家人要“树德”“滋德”“经德”“厚德”“勤德”“敬德”“重德”,将德育作为治家第一要务,视培育高尚人格为育人之本。

表现具体德目的题字有“仁让教家”、“仁厚宇”、“务为仁”、“安仁居”、“忠恕”、“忠信”、“忠厚”、“孝

收稿日期:2000-10-10

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OIYKS026)

作者简介:杨雅丽(1956-),女,陕西武功人,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汉语与文化史研究。

弟”、“孝弟慈”、“敬恕”、“笃敬”、“谦受益”、“谦和”、“谨慎第”、“勤谨和缓”、“克勤厥家”、“勤俭”、“俭素”、“勤俭持家”、“勤俭忍”、“安忍之”、“百忍堂”、“慎修永思”、“惠笃叙”等，多方面弘扬了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宣扬仁、孝、悌，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仁，是中国人道德体系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德目。儒家将孝、悌、礼、恭、敬、信、让、忠等皆纳入仁的范畴，从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等多方面表述了仁。仁既指“爱人”这一特殊德性，还可指包括孝悌等各种德目在内的一切德性之总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2](P53)。仁虽为“最高之人格”，但并非高不可及，“人人时时有可以达到之机缘”而成为“仁人”[3]。仁的核心是“爱人”。儒家认为爱有等差，首先是爱亲人，其次是他人，因此孝悌是仁的根本和出发点。《礼记·祭统》曰：“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4](P220)儒家认为，“夫孝，置之而塞乎天下，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4](P212)，是宜于天下万方的共性人伦。悌指弟对兄恭顺，兄对弟友爱。杨东莼先生认为：“孔子之道，实以中庸与仁为本，而仁之本则为爱。然孔子的思想，未尝离开家族主义，他实欲以家族主义的道德，而谋当时社会的改革；此种思想，正是家长制的农业经济的反映。他既以家族主义的道德为改革社会的工具，所以他特重孝悌。”[5]由于孝在传统文化中是十分重要的道德项目，因此韩城人将孝悌书于门额大加提倡，有特殊社会作用。家族成员间亲睦有利于宗族的团结与发展；仁与孝悌的伦理教化还能使人产生美善情感，在涉足社会时将爱亲之心推及他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孝、悌作为民族传统美德，人们千百年来遵循之，弘扬之，并将其推演升华为内涵更广阔的道德原则，即尊老爱幼、关怀他人。

2. 宣扬谦、慎、忍，表现了中华民族谦虚谨慎、忍耐克制、坚韧顽强的性格特征

谦，即谦虚谦让。自谦便能虚怀若谷，懿德日进；谦和待人，便能尊人而达到尊己。慎，指处世待人的谨慎态度。儒家主张“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强调“慎言慎行”。忍，即忍耐克制。《论语·卫灵公》有孔子“小不忍则乱大谋”之语，是说为了大局应忍受在琐碎事情上遭遇的委屈。事实上忍受委屈

和灾难是对人精神的磨砺和重塑，能超越苦难便能成大器做大事。中国人高度评价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终于复国报仇的坚韧性格。司马迁赞颂那些遭受苦难，在忍耐中磨砺自己，终于成为不朽“立言”者的伟人：“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正是从他们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完成《史记》“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就极刑而无愠色”。在司马迁和他景仰的古代圣贤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坚韧不屈的伟大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影响下，韩城人基于对艰辛人生的深刻领悟，将“忍”与“百忍”高悬于门额，视之为一剂应对人生凶险的道德良方，希冀子孙处世时忍让克己为先，一旦面临苦难与挫折当忍耐之，战胜之。

3. 贵勤尚俭，体现了中华民族诚实勤劳、俭素养德的优秀传统

崇尚勤俭是韩城门额题字的重要内容。在浩如烟海的华夏典籍及民间文学中对勤奋创业精神的勉励不绝于声。韩城谚语云：“地是刮金板，人勤地不懒。”“地是聚宝盆，看你勤不勤。”“地是父母面，一日见三遍。”“要想日子富，鸡叫三遍离床铺。”勤能获得财富，而俭则可以持有财富。俭，不仅要珍惜劳动果实，还要“量入为出”，不使物力竭尽。韩城谚语曰：“能勤不能俭，到头没积攒。”“节约成习惯，穷汉变富汉。”“一天省一把，十年买匹马。”“指缝松一松，一年去几升。”“细水长流，遇灾不愁。”“粮食万石，也要粗茶淡饭。”[6]俭还是人格修养的重要内容，孔子把“温、良、恭、俭、让”并提，作为重要德目。老子认为做人处世的三宝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墨家宣扬节俭，主张“节用”“节葬”。诸葛亮将“俭以养德”作为修身准则。古往今来，中国人都把节俭作为美德，韩城人崇尚勤俭，还有深刻的地域性历史原因。“韩城历史上自然灾害较多。根据上自周朝，下迄民国36年（1947年）的资料记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593次。其中旱灾占53.2%。”“自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至民国36年（1947年），本市共发生旱灾316次。”严重的旱灾如：“唐宝应元年（762年）旱蝗疾疫，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明崇祯六年（1633年）陕西旱，饿殍遍地。韩城四至八月不雨。麦秋无收，冬无雪。”[7]频繁的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和严峻的考验，也使他们产生了

强烈的生存意识与创业冲动,他们必须勤劳以获取更多财富,又必须节俭积贮,以防备随时降临的灾害。韩城人书于门额的“勤”“俭”二字,既是他们信奉的道德条目,也是关中特殊自然环境在人们心头留下的深刻印记。

4. 视忠、恕、信为处世圭臬,宣扬忠诚守信、推己及人的道德观念

忠、恕是与他人相处的道德准则。忠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重要且蕴涵丰富的德目,可指对民族对国家尽忠守义,亦可指臣、子全心全意为君、父效力,还可指与人相交中忠诚尽心。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勿欲加诸人。”(《论语·卫灵公》)信,指诚实不欺,言行一致。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基本美德。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与道德实践中,忠、恕、信成为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今人推演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重要因素,这就是体谅、宽容和关怀他人,要求自己恪守信义,忠于职守,忠于祖国和人民。

韩城门额题字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道德精神世界,表现了中华文化道德至上,突现人格尊严的鲜明特征。那赫然书于千门万户之上的道德类题字,是高悬于人们心头的明灯,照耀着、警醒着人们修身洁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

二、肯定对功名事业的追求,张扬积极进取、入仕有为的价值观

韩城有许多建造于明清的四合院,一些家族的祖辈有过科举功名或入仕为官的经历,其门额题字便炫耀家族在功名与事业上的辉煌。如“状元”、“进士”、“世进士”、“岁进士”、“黄堂第”、“大夫第”、“十马高轩”、“世科第”、“登科”、“太史第”、“内翰第”、“外翰第”、“兄弟司马”、“大郡伯”、“父子御史”、“九重锡命”、“名登天府”、“紫府玄机”、“忠勋第”、“皇恩第”、“承恩第”、“恩荫”等。在搜集到的题字中,此类题字约占总数的1/6,它们反映了韩城历史上重视文化教育,并培育了大批文化人才和具有经国济世才能的人仕者。

韩城有悠久的历史教育传统。早在周宣王时(公元前827~782年),韩侯治韩国于此,即设学官府。战国初孔子高徒子夏为魏文侯师,曾设教于此,广授生徒。最让韩城人铭记不忘的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诞生于此,成长于此。他经历痛苦磨砺著成《史记》的卓越成就与伟大精神成为韩城人追求知识,向往真理,积极进取的强大动力,司马迁身处逆境而自

强不息的坚韧人格已融入韩城人的性格之中。千百年来韩城人重教成风,办学兴教历代不衰,文化人才层出不穷。在人的精神塑造与价值取向上,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主张关怀社会,入仕有为,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封建教育长期与入仕、功名相挂钩,因此韩城昌盛的文化教育创造的最直接社会效益便是培育了大批学业有成、入仕为官者。宋元明清几代韩城有进士115人,状元2人。明清两代是韩城文化教育的盛世,科举取仕者达800余人,其中进士90人,举人544人,解元14人[7],因而韩城有“士风醇茂”、“解状盛区”之誉。这种重教兴学、人才辈出的文化背景为韩城门额题字的产生与传播、盛行提供了必备条件。在我国古代以农耕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下,乡村“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乡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柢”[8],而韩城正是中国古代发达的乡村文化之缩影。韩城文人的出路不外两条:一批学子因科举成功远离故土,但他们将为官之地仅视为生命旅途的驿站,最终又告老还乡,将文化带回故里;大多数文人始终未能走出家园,便在乡村设馆讲学,传播文化。这两种文化人殊途同归,都是乡村文化的播种者。他们与韩城浓郁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是韩城门额题字的拟稿者与书写者。这种“显耀类”题字正是韩城历史上教育兴盛,人才辈出的写照,也是韩城人追求事业与功名,渴望实现人生价值的历史见证。

三、尚诗书重农耕,表现了中华民族耕读并重的文化心态

中国人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历代教育制度与教育教学内容不尽相同,但自先秦以降各代皆以儒学经典作为必备教学科目。韩城门额题字中“耘经第”、“诗礼第”、“诗书第”、“诗书传家”等条目正表现了中国人视教育为民族生命脉与传统教育以儒学经典为首要内容的教育模式。经,指儒家经典,“耘经”是要子孙读儒经受教育。“诗书”本指《诗经》与《尚书》,孔子将《诗经》、《尚书》与《礼》、《乐》、《易》、《春秋》,并称为“六艺”,确定为六种必备教科书。儒家有“诗教”、“书教”之说,认为“诗教”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尚书》兼有政治教材和历史教材之作用,后世因以“诗书”称代儒家经典。

儒经被当代学者推崇为“中华元典”,认为它“具有宝贵的文化发生学意义,为文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内在的规定了发展的路向”[9]。韩城人将“诗书”镌于门额,不仅表现了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与

对子孙成才的殷切期望,还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元典”精神哺育下文化源远流长的史实。

值得深思的是,韩城门额题字还将“耕”、“读”并提,如“耕读”、“耕读第”、“耕读传家”等。耕,当指农业劳动;读,当指读儒经。这种题字以耕读并重当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古代中国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夏商周时期农耕文明的时代已经到来,到春秋战国时,诸侯争雄,农业之强盛与军队之壮大成为争夺天下的关键。各国为在竞争中取胜纷纷变法,商鞅在秦国变法,实行耕战并重,遂使秦国强盛而终于灭六国,王天下;汉朝推行重农抑商之国策,进一步巩固了以农为本的治国思想。西汉政论家贾谊、晁错曾上书皇帝,论证了当以发展农业、积贮粮食为“国之大命”。汉以后,各朝统治者将“重农固本”作为不变的基本国策。关中地区有一条广为流传的凝聚着华夏民族重农情结的谚语:“七十二行,庄稼为王。”可以说,中国璀璨的古代文化即是一种建构于农业经济之上的农耕文化。在此文化背景下,农业被置于至尊地位,可与读圣贤书同为理家治国之本。虽然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亦有人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重农观念已在民族意识中根深蒂固,成为思维定势,韩城人将耕读并重正说明了这一点。

韩城门额题字中还有一些题字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对生活的领悟与追求。如“清白家”、“清白长远”等表白宅主最珍视和向往的是洁白无瑕、高尚美好的道德境界;“清平乐”、“清平轩”是说当以清白平安为人生乐趣;“平为富”、“和为贵”认为平安和谐、无大变故即是幸福;“自怡室”、“朴园”、“淡泊”把自怡、朴素、淡泊作为人生佳境;“安居乐”、“平安居”、“安居”、“履无咎”、“履泰”、“康而福”、“福寿”、“自求多福”、“丰宁居”、“元吉”、“贞祥”、“修吉”、“长发其祥”等表现了对安宁、吉祥、幸福的追求。

韩城门额题字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1)它是

民间文化的特殊存在样式,在一定区域内对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产生了持久深刻的影响,对家族成员的思想品格、价值观念及他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有积极作用。今天我们正致力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这种家族文化形式可以给我们宝贵的借鉴。(2)韩城门额题字弘扬的民族传统美德代表了中国人内在的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模式数千年来以潜移默化、滴水穿石、永未止歇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民族的整体,并给个体以行为的准则和依据。文化具有跨越时代和超越政治体制之能量,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至今仍有根深蒂固的广泛影响力,韩城门额题字宣扬的传统美德在民族精神改造与重建中有不朽的价值。(3)韩城门额题字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有弥足珍贵的研究价值。“传统文化是经世代代的社会生活实践承传下来的东西”[10],韩城门额题字正是留存于民间的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是传统文化研究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参考文献:

- [1]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3]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4] 许嘉璐.文白对照十三经[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 [5] 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6] 王忠泰.渭南地区民间谚语集成[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 [7] 韩城市志编纂委员会.韩城市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 [8] 王钧林.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J].学术月刊,1995,(10).
- [9] 刘蔚华.儒家文化的新启动[J].孔子研究,1999,(3).
- [10] 常思敏.传统与现实生活[J].哲学研究,1995,(2).

[责任编辑 徐怀东]

On the Cultural Meanings of Door-top Inscriptions in Han Cheng, The Hometown of Si Ma-qian

YANG Ya-li

(Wei nan Normal College, Wei nan 71400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door-top inscriptions in Han Cheng City, which have been developing traditional Virgins of Chinese Nationality, popularizing the positive living attitudes and values of being somebody like senior officials, and reflecting one of national culture qualities—being both a farmer and scholar.

Key words: door-top inscriptions; virgin; official promotion; farming and reading